

## 东旻老师 | 《翻译石门坎系列资料的历程与感悟》

晚上好！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未知的中国》和《塞缪尔·柏格理》这两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在翻译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最后我还会简单介绍一下柏格理在石门坎的同工。

提到《在未知的中国》，首先就要讲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叫东人达。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父亲在当时的毕节师专任教。有一次，学校图书馆处理旧书，我父亲花五毛钱买了一本，那本书里有关于柏格理的记载，对柏格理的评价很高。他当时便产生疑惑，他想：“既然说传教士都是侵略中国的先锋，那么柏格理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呢？”既然心里有了疑惑，于是他便找机会，在 1987 年的暑假期间，带学生去石门坎做社会调查。他带着三个学生坐着拉煤的车晃了一整天，那时的石门坎还不通电，四个人用半盆水洗脸，夜里睡觉的时候，风吹着石块儿在房顶上滚来滚去，条件艰苦的令人难以想像。我父亲就想，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奉献精神，才能长期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坚持下去，以至于后来我父亲经常说，凡是能去到石门坎的人都很了不起。那次在石门坎，我父亲亲手拂去了溯源碑残片上的灰尘，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拿定了主意，要尽自己的全力去揭开那一段尘封的历史。后来在他的余生里，我父亲从未间断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并且他还把懵懵懂懂的我带进了这个领域。

第一步，我父亲设法在英国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当事人及其后代，并逐渐联系上了当年曾在贵州传过福音的英国传教士张绍乔、张继乔、甘铎理，还有柏格理的小儿子欧内斯特等人。1989 年 1 月，他得到了张绍乔赠予的柏格理日记，并翻译出一章刊登在 1990 年的毕节师专学报上。刊登出来之后，从石门坎走出来的苗族同胞杨忠德、杨忠信看见了，就联系我父亲，并请他寻找

其它的相关资料。我父亲不负重托，用了八年的时间找到了《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石门坎与花苗》、《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日记》。他又拜托张绍乔和张继乔写了其父母在石门坎的简单经历。我父亲带着我翻译这些资料，前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最终于200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在未知的中国》。

下面讲一下我和石门坎的故事。阿信让我分享的时候，我说不知道题目该怎么定，阿信就和我开玩笑，他说：“你讲的题目就叫‘我被柏格理害惨啦！’”，他还打了个感叹号。其实我回想一下这些年的经历，他开玩笑的那个题目似乎也不无道理。我从十来岁的时候开始读《柏格理日记》，到如今都快30年了。刚开始只是单纯地帮我父亲干活，后来翻译出版了《在未知的中国》，还有点小开心。等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爸爸把它寄到英国，然后张继乔牧师——他是驻石门坎的最后一任牧师，他似乎看到了希望，把我当作了历史传承人，当时写了好多封信过来。

那个时候很感兴趣，也有点小成就，很开心。然后再到后来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就很厌倦，有一段时间就非常想摆脱柏格理。但也就正是在那段时间，是翻译这本传记《塞缪尔·柏格理》的时候。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觉一定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翻译出版出来才行，感觉自己似乎是上辈子欠了柏格理的。

翻译修改这本书的期间，在贵阳唐亚平老师的带领下，又拍了纪录片《百年石门坎》。那期间的过程，我总是想把这些事情赶快弄结束，结束了以后的话就永远摆脱他。结果等这本书出版完之后，这个片子拍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其实是彻底摆脱不了了。然后自己的心态也彻底改变了，也不想摆脱了，我想这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我在翻译过程当中所得到的感动，第二就是书出版以后读者给我带来的感动。

有时候我在想，我这一生竟然是由两个英国人来决定的。第一个人自然是柏格理，第二个人是解放之前，在贵州威宁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甘铎理的女儿艾丽森。我父亲在英国打广告的时候找到了甘铎理，他就和我父亲一直保持联系，但大概是我在读高中期间，甘铎理去世了。她的女儿艾丽森根据她父亲的通讯录，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她的字迹非常潦草，我爸爸当时没有看懂。那个时候我也还小，这封信就一直搁着，一直搁到我上大学。我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我爸爸把这封信拿给我，他说：“你如果能看懂的话，你就给她回一封信吧。”我看懂了这封信，我给艾丽森回了一封信，跟她说“很抱歉，我爸爸当时没有看明白，但是我知道你父亲去世了，很难过。”然后，艾丽森，她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她也是当时所有传教士后代当中唯一，我所知道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我记得很清楚，她接连给我回了三封信，从那时我开始认识她，然后成了她的忘年交。

1995年，石门坎第一次允许外国人进入的时候，艾丽森和张绍乔的女儿海伦，她们就去了石门坎。2000年的时候，她又要去石门坎，她联系的是中国社科院的石茂明老师。石茂明老师是因为要做沈红老师的一个助学项目，所以要去石门坎。我呢，作为艾丽森的翻译，2000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石门坎。那是我第一次去石门坎，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那一次去石门坎，改变了我的的人生。

我当初是学的英语专业，自己对历史又比较感兴趣。我最初对自己的人生设定是学好英语，学好历史，然后做一个英文导游，带着外国人到处去游山玩水。可是2000年，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和艾丽森去石门坎，经过了那次在石门坎的经历之后，我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们是从威宁出发去石门坎，那时候从威宁到石门坎要走一整天，车子特别颠簸，到傍晚的时候才来到石门坎。送我们去石门坎的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送到了之后没有停留，饭都不吃，马上就走了。然后我们在石门坎一起待了十来天。

那天晚上，到石门坎吃的东西，我记得大概都是一些白水煮的土豆、豆角，有盐有辣椒都已经算比较好了，后面几天在石门坎的农户家庭走访的时候，好一点的家庭，煮土豆的时候放一点盐巴，那就已经条件很好了。我记得还有很多家里断粮也没有吃的。我还去了麻风村，那时候麻风村里还有四个病人在犯病，我们当时去麻风村的时候就很难找到向导给我们带路，最后还是负责管理麻风村的那个副乡长带我们去的。之前很积极地带我们去各地的所有的人，都回避了。麻风村，还有那些麻风病人，他们当时的情况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麻风病人，看到他们残疾的手、残疾的腿，也知道那个时候政府一个月就给他们26块钱。我当时问：“26块钱，那怎么能够你们吃呢，你们手脚残疾又没有劳动力，不够的话怎么办？”他们当时就说：“没有办法的话就爬到昭通去讨口”，就是爬到昭通去要饭。

除了麻风村之外，在我的去过的地方，最贫穷的地方就是新营。后来卞淑美老师，她们的新中小学就是指新营和中寨。当时那个新营特别贫穷，那些房子特别破旧，特别悲惨。这些贫穷给我带来的震撼非常的大，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贫穷的地方。当然也有特别美好的回忆，虽然也是跟贫穷有关，我在那个年丰村的苏科寨记忆就非常深刻，就是在苏科寨带给了我很多感动，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记得我们刚到苏科寨的时候，首先跑来迎接我们的是一大群狗，叫得地动山摇的，然后我们到了廖登海的家里，他们家是苏科寨的唯一一户彝族人家。他们家应该是什么都没有，我看他们借来了面条煮给我们吃，走的时候有人送我们，我背了一个包。他们送我们的人先帮我背着那个包，所以我也没在意，送了很远的一段路程，他们要回去了，她把那个包给我，我当时就震惊了，因为那满满的一包都是煮熟的鸡蛋，还是热的。当时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不忍心，我感觉他们是把全寨子的鸡蛋全部都拿给我们了。当时他们还有人脱下身上的裙子送给了艾丽森，送给我们鞋垫。我就在想我们大部分人是因为自己有了很多东西给别人一点点，但是这里的苗族、彝族他们

是自己什么都没有，他们借来东西也要给你。那种热情，那种善良，那种淳朴，真的让我很感动。我们走的时候，他们站在村口唱着歌送我们。山路很弯曲，我们走到了很远，但是回头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村口，看到他们还在那里站着。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唱歌。当时歌声一响起，我的心里就流泪了。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做一点点事情，我也帮不了什么，至少如果说我能帮苗族培养一个大学生出来，我就很开心了。这是当时定下的一个小目标。

后来石门坎的贫穷和这里人的热情淳朴，再加上历史上柏格理他们的那些事迹。这一整个震撼了我，然后也感动了我，我就开始重新做自己的人生规划。但当时很年轻很茫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后来就想那要不先去中央民族大学，到那里去看，看了就知道该做什么。这就是我考到北京来读研究生的原因，所以石门坎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柏格理和艾丽森，他们是我命运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

在石门坎，还经历了其它的一些事情，比方说那边的路很难走，我们去看杨雅各的那个墓回来的时候，那个路是很窄很窄的山路，下面就是悬崖，只能侧着身，背靠着山挪过去，根本就不敢往下看。另外，在石门坎待了那么多天，也就十来天吧，我的两个大脚拇指头全部是被磕掉了，长了一年才长出来。

所有的这些我很感动，因为当时的那种艰苦就是我此生很难想象的。然后，我在想，这已经是柏格理到石门坎的一百年之后了，那一百年之前石门坎是个什么样子？那种艰辛、那种不容易，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后来我也经常去石门坎周边，甚至更远一些地方的寨子，在那些地方，走路的话，真的是，你穿那种雨鞋一脚踩进去，往往是脚拔出来了，那个鞋还在泥里。后来我翻译这个传记的时候，我也看到柏格理他们有时候走的那个山路泥巴都能齐腰深，所以当时他们的那种艰苦更是无法想象的。

我得到《塞缪尔·柏格理》这本书，是艾丽森 98 年寄给我的。她当时认识我之后，就把这本书的英文原著寄给了我，但那个时候我还在翻译《在未知的中国》。而且她寄给我的复印件当中也有一些缺页，所以一直也没有开始翻译。一直等到后来 2011 年，张道惠是和柏格理一起开创石门坎传教中心的英国传教士，他的孙子来到中国访问石门坎。他回英国之后，把这本书的电子版也发给我们，另外我告诉他的缺页，他又拍照片发给我，把所有的图片又扫描发给我，然后我们开始启动翻译《塞缪尔·柏格理》这本书。

这本书因为是涉及到宗教，涉及到民族，所以通过国家宗教局和国家民委的审读，审读就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后来又反复修改，我又去昭通、昆明、彝良、石门坎、威宁这些地方考察地名，阿信特地去了大凉山帮我考察地名，最终在石门坎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之下，在很多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出版。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过的人。也特别感谢这本书的所有读者，因为很多读者都让我很感动。前几天才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说她已经读这本书读了有好几遍了。有这些读者和这些感动，让我觉得我翻译这些书真的是很值得。但翻译这本书我也是很用心地在翻译，我觉得这也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一本书。在这里顺顺便提一句，就是所有的读者，如果你们读书当中看到错误，请告诉我。以后等条件允许，如果这个书可以再版的话，我会把这些错误全部改正，谢谢大家！

上面是翻译这些资料的历程，下面讲一下我翻译这本传记的一些感悟。

关于这本书的感悟，我今天只想分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柏格理他们传教之艰难，通过这本书，我感觉到柏格理他们真正正是冒着生命危险，用生命在传福音。第二部分，我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感悟，是我自己对柏格理的品性，我的总结，我的观察。

柏格理，他们这一辈子特别不容易，他们传教特别艰难，艰难地超乎人们的想象。在这一点我想提及四个方面，因为这四个方面都是涉及到他们生命的，涉及到生命的，都会让他们冒生命的危险。

第一部分就是，柏格理一世清贫，他第一个不容易就是穷，他一生都特别缺钱，小时候家里就很穷，也就是因为家里穷，所以他数学天分那么高，他也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等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他这一生也都在四处呼吁，在各方寻找，在找各种机会筹集资金，想奉献给中国西南的传教事业。他们来到中国传教之后，资金和人手都严重不足，这是困扰柏格理一生的难题。

最开始开创苗族传教事业的时候，传教团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柏格理等于是先上车后买票。最开始的时候，开创苗族传教事业，大部分都是苗族自己奉献的。到后来修建石门坎学校，创制苗文，翻译苗文圣经的资金都源自于柏格理申请的阿辛顿基金，最后柏格理感染伤寒去世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1915年那个时候，英国的传教委员会命令柏格理，必须要削减传教团在石门坎这边的经费，柏格理没有办法，就解雇了在学校里为学生们做饭的汉族厨师，而是让其他的苗族老师去找了一个苗族妇女过来做饭。但就是那个苗族妇女有伤寒，她给男生做饭，把这个病带到了学校里，然后感染了王树德，柏格理又照顾王树德，自己也感染了。王树德是因为他当时刚打了疫苗，他去照顾学生而感染的。柏格理最终由于常年的过度劳累，身体过度虚弱，没能扛过这次伤寒病而去世。

第二个艰难就是蓄意谋杀。柏格理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想暗杀柏格理。最严重的那次就是1907年4月8日那天夜里，柏格理惨遭毒打，差点丧命。另外的话还有很多人很多时候都想杀柏格

理。1906年6月底柏格理传教途中，他们有人放火，故意想放火，想烧死柏格理和张道惠。义和团的时候，还有人把恐吓信贴到他们传教团驻地的大门儿上，说要杀死他们，还有一次也是暗杀。

那一次暗杀柏格理是晚上的时候，柏格理他们在开会，和基督徒们、信徒们开完会以后，柏格理和王先生送这些信徒出门。出门的时候，王先生跟柏格理去关门，然后柏格理先走了一步，王先生继续在那儿关门，走到院子里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柏格理哼着歌儿就过去了，但是他不知道那儿藏了一个刺客。柏格理后面也很奇怪，为什么刺客没有向他动手，他后来说，可能是他走到那儿的时候，那个刺客还没有准备好，但后面那个王先生路过的时候，刺客就动手了，刺杀了那个王先生。不过王先生因为当时感冒穿得很多，因此他的感冒救了他一命，所以没有成功，他最后活下来，但是这个刺杀也是很危险。还有一次就是柏格理去大凉山的途中，他要渡江，渡江的时候他们想害柏格理。他们想在渡江的时候制造船只失事，但当时柏格理很幸运的就是，龙云在他的船上。他们想杀柏格理，但是他们很忌讳、很害怕龙云。因为龙云如果去世以后的话，他们会有很大的麻烦，他们本来计划想让龙云坐后面一条船，不要跟柏格理同乘，结果龙云没有，他跟柏格理同乘，所以救了柏格理一命。

第三个危险就是疾病，他们从英国过来，过度辛劳，并且水土不服，柏格理和传教士们都饱受着疾病的折磨。之前阿信也讲过了，圣经基督教教会第三批来华传教士当中的卡特，刚到中国就病死在安庆，当时还在学汉语的时候。第一批来华传教士当中的索恩，1891年也病死在昭通。万斯通也是受疾病的折磨，不得不回英国去。早在1890年26岁的柏格理，在东川的时候就有犯病，他自己有记述。柏格理记述到：“我去理发，就在理发师折腾我的时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过了一會兒，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泥土地板上，我拼命的想，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浑身被汗湿透了，这样的情景让我非常害怕。我在中国的内陆深处昏倒了，厚着脸皮用汉语求助，



我身上很痛。”这是柏格理的身体在向他发出不可以长期过度劳累的警示，然而，自那以后，类似的突发疾病却伴随了他一生。

传教过程当中，第四个危险是山高路险。柏格理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前往云南的途中，就在长江三峡遇险翻船，差点儿就丢了性命。还有这本书第 52 页到第 53 页，他有一次写他在云南过河的时候。“就这样，凭借一根绳索越过河中的激流划到对岸去，对我们两个而言都没有丝毫的诱惑力。椅子往这边划过来了，我们必须拿主意。如果我们要把福音带给这里的民众，就不能被一只木船或一条摇摇晃晃危险的绳索打垮。椅子到了，管溜索的男子说：'请上去吧'。我把双腿放进座位，心一下子吊在嗓子眼儿上，他们又拿来一条粗绳子把我固定在椅子上，以免我在滑到中途的时候，头晕目眩，控制不住。我用双手死死地抓住吊着椅子的大木环，双眼紧闭荡了出去，下降，下降，再下降。然后停住，我就在一英里长的礁石、漩涡和激流上摇摇晃晃。我害怕得根本就不敢低头往下看，直到绳子一紧，我知道他们开始把我往对岸拉了。几秒钟过后我安全地站在了对岸的岩石上，想想刚才自己怕成那副样子，也是有点好笑。”

上面是他和索恩一次用溜索过河的经历，但这种路途当中的危险，其实充满了柏格理的人生。柏格理和埃米去结婚的路上，得知索恩死亡的消息，柏格理就赶去昭通帮忙。在那期间他患了严重的疟疾，好了之后，他和埃米继续往重庆结婚。但是那个时候他身体就不好了，他们就雇了一顶轿子，柏格理描述到，路特别难走，他们在很多地方遇险。比如：当遇到急转弯的时候，而路只有 60 厘米宽，一个轿夫在这头，一个轿夫在那头，轿子就悬空了，在悬崖上摇摆，一失足就会丢掉性命。在路途中有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比较好玩儿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一次在威宁传教的途中，过一条特别弯曲的河。柏格理说弯曲到，他们一路上得过这条河 60 次，我不知道这个 60 次是确切的数字呢，还是一个夸张的概述，但是过河的时候，水流特别湍急。钟焕然是一个本地布道

员，他害怕柏格理会被水冲走，就让学生抓着柏格理的辫子，但是柏格理不服气，他拼命地往前走。这样负责抓他辫子的学生就被柏格理拖着走了，所有的人都被柏格理逗乐了。

上面讲的这四点就是柏格理传教之艰难的：一世清贫，蓄意谋杀，疾病缠身和山高路险。我认为这四种艰难，对于柏格理而言是最不容易的，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危及他的生命。其它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差异、汉语汉字很难学、大人骂他洋鬼子、小孩儿向他扔石头、他睡在猪圈上面或者是牛圈旁边；睡觉的时候睡在地板上，半夜下了雨，屋子漏了，他得起来挪铺盖，或者是一整晚上的跟跳蚤打仗。这些虽然是很艰苦，但没有危及到生命，比我前面提及的那些反而好多了。

柏格理传教很艰难，让我很揪心，但是他的人品很高尚，又让我特别感动。对他的品性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分享给大家。

首先，第一点，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无需多言，因为他一生都在传福音，他人生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为上帝赢得更多的子民，在这个传记的第 46 页，柏格理有这样一段话，我念给大家。柏格理说：“我曾经在会议上许下诺言，我们将要让数千个灵魂皈依，特别提醒一下，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有人可能会说‘他是一个傻瓜’，那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定要让数千人皈依。‘他会变成一个疯子’，任由他，我们定要让数千人皈依。‘他太年轻，过于狂热’，是的，荣耀归于上帝，我就是这样的，我们定要让数千人皈依。”我想柏格理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其实他死后仍在传福音，如果说他能在天有灵，知道远到一百年后，他仍然在影响着很多人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欣慰、非常开心的。

第二点，就是柏格理的善良。柏格理特别善良，他一生都活在爱里，他一生都在爱别人，他爱麻风病人，爱小孩子。他爱小孩子，有一段画面我记得特别温馨，有一个苗族小女孩儿叫韩梅，威宁的，住在距离长海子 50 多英里的寨子里。柏格理正在韩梅家的火堆边烤干双脚，小姑娘进来了，伸出柔软、温暖的双臂，搂住柏格理的脖子，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讲述她的全部秘密，然后她还伙同自己的小朋友哄骗她的老师吹口琴。其实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点嫉妒，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去苗族寨子里，也有苗族小姑娘喜欢黏着我，但是从来还没有哪一个苗族小姑娘能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在我的耳边讲悄悄话。这种情况我都没有遇到，但柏格理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他的善良，他的爱，我们就从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本书的第三卷第一章的最后一段，格里斯特是这样写的，我念一下给大家听：“柏格理在一封信中提到，有一次，他在旅途中和一位失去妻子的医生结伴同行。这位医生向柏格理描述了他和孩子在扬子江上遇难的往事。小孩儿沉到江底，父亲已经完全绝望，忽然看见孩子又被江水冲了上来，医生竭尽全力的抢救他，控干了孩子肺里的水，做了人工呼吸，却依然看不见任何生命迹象。此刻一位站在旁边的中国妇女，抱起了没有生命的躯体，解开上衣，把孩子捂在自己的胸口上，并用她的外套把小孩裹住，小孩听见她的心跳竟然苏醒了，最后毫发无伤地回到父亲身边。妇人对小孩儿的拯救，就好比柏格理为穷苦的苗族人所做的一切。他把苗族揽入怀中，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分享给他们，让他们感到温暖，并由此觉醒。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暖，那部落里的人，即便是眼睛里闪烁着对新生活的渴望，也无法让自己的民族再次振兴。”

这一段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柏格理正如格里斯特写的那样，他就像那个妇女，穷苦的苗族对于他来说其实可以说是毫不相干、也不认识的路人一样，但是他把苗族揽入怀中，给了他们温暖，带领他们觉醒。柏格理的孙子，也就是他的小儿子欧内斯特的儿子斯蒂芬，他跟我讲过，他说，柏格理就好比圣经里的好撒玛利亚人，有人被强盗剥了衣服打得半死，祭司路过了，利未

人也路过了，没有人管他。只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给他包裹伤口，带他到店里救治。柏格理正是这样无私地爱护着、温暖着苗族，引领他们信主，带领他们的民族振兴。以至于在他的带领下，石门坎那一带的苗族被称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是“海外天国”。那个时候写信的话，从国外寄封信过来，下面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收到。

柏格理的第三个品性就是正直。不但正直，而且还非常耿直，耿直到自己最后在教会里几乎没有朋友，除了邵慕廉和王树德之外。我们从这个书里面也有很多事例可以讲，可以看到柏格理的正直。比方说有一次柏格理在传教途中下雨，他被迫躲进了一间茶馆，书里是这样写的：“旁边是一张赌桌，我一直看着，愤怒的热血都要燃起来，两个男人显然勾结好了，正打着如意算盘，想诈骗几个男孩儿的铜钱，我一直厌恶地盯着他们，最后实在压不住怒火，走过去毫不留情地骂了他们一顿。各阶层的人都沉溺于赌博，从小孩子到老人。”所以我觉得柏格理这种品性真的是很值得珍惜。哪怕是现在，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这样，看到旁边在实施诈骗，他压制不住怒火，过去就能把那些骗子骂一顿。

这本书的后面还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被母亲和继父养大的年轻人，当时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都还很小，而他已经结婚了，在妻子的挑唆下霸占了家里的房子，还自私无情地把母亲和继父，还有弟妹们都赶了出去。这个不孝子让自己的母亲、继父和弟妹们都无家可归，只能寄居在邻居家的马厩里。可怜的母亲在马厩里生下一个孩子，而女人在别人家生孩子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儿。没过多久，柏格理来到这个寨子，听那位母亲亲口讲述亲身经历的遭遇和耻辱，同时柏格理也发现自己的房东也曾怂恿不孝的儿子驱逐母亲。他很愤怒，断然拒绝再次睡在这种人的屋檐下，义愤填膺的柏格理找到了那个不孝子，狠狠地训斥了他。这一点感动我的就是柏格理的这种爱憎分明。他自己的那个房东去怂恿过不孝子，他就立刻搬离了那家。

第四点，柏格理的品性是他的侠义。这一点的话最感动我的那个故事，是这本书的第 335 页和 336 页，柏格理帮助麻风病人老王那一家。老王和他儿子都得了麻风病，他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被感染了，小女儿还是好的。柏格理去处理他们家这个事，给老王这一家建了新房子，让那个感染的大女儿照顾老王和兄弟，然后把她的那个小妹妹送到叔叔家去。把这些处理好，帮助这个麻风病人这一家。但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一件事，就是老王他们搬到新家以后，老王他们原来住过的那个房子，有一个汉人，他贪图便宜，竟然不可思议地要买下那个房子。柏格理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就从中插了一杠子，他的做法是他自己抢先在那个汉人之前买下了老王他们原来的老房子，然后放了一把火，把那个房子给烧了。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因为那个汉人应该说是一个很贪婪的人，或者说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否则的话应该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可是柏格理竟然为了这样一个人宁愿自己花钱把房子买下来烧了，也不要让他感染，他爱世人。

他的这种博爱让我很感动。除了他的博爱，还有柏格理的宽恕，也让我非常感动。柏格理的胸怀十分宽广。他宽恕别人，甚至可以宽恕图谋杀害自己的人。1907 年 4 月 8 日，柏格理投宿在苗族寨子杭利米的一户人家。他被这户人家出卖，遭到毒打，差点儿丧命。那个时候，在紧要的关头，是有一个穿羊皮上衣的男子，伏身掩盖住柏格理，救了他的性命，这是 1907 年 4 月 8 日的事情。直到 1911 年初柏格理才知道救他的这个人叫杨世和。他知道以后马上就回到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去，找到杨世和去感谢他。但那一次，他也见到了出卖他的人，但是柏格理在 1911 年 3 月给妻子的信里说：“那个苗族叛徒和在杭利米打过我的人，如今都在读我们的书并信奉了基督，他们看上去很真诚，假如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为那个出卖我的人施洗。”读到这个地方，我特别特别感动，因为柏格理心胸宽广，竟然还想到愿意为出卖他的人施洗。要知道，因为他的出卖，柏格理是差点儿被打死的。每次读到这里都会让我想起马太福音第五章第 44 节里，耶稣教导人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柏格理另外一个很让我自愧不如的品行就是勤奋。我们从书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比我的好多了。柏格理对中国的经典著作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终其一生，柏格理都在不断地读书学习。他读希腊文的圣经，研究论语、研究孟子，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在这本传记里，我们总会不时地看到，作者告诉读者说，柏格理在哪一个时期读了些什么书，一直到柏格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都还在读《黄金链》、《人和宇宙》等书，学习的习惯持续了他的一生。

前面讲的是，我的石门坎系列资料翻译的历程和我的一些感悟，最后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柏格理在石门坎的同工。

柏格理在石门坎最重要的同工，前期是张道惠，后期是王树德。我先介绍一下张道惠夫妇和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张道惠和他的夫人安妮，张道惠从柏格理最早开创石门坎传教中心的时候，就一直跟随柏格理，帮助柏格理。安妮是 1906 年来到石门坎，张道惠夫妇一直和柏格理一起住在五镑小屋里面，创建石门坎，然后在石门坎做工。

张道惠的思维方式，他所擅长的和柏格理不太一样。张道惠擅长做一些工程方面，做一些很实业方面的事情。去过石门坎的朋友们都可以看到，石门坎还有游泳池的遗迹。其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上面的牌子上写着是柏格理修的，但那是错误的。游泳池是张道惠夫妇主持石门坎工作期间修的。因为，石门坎每年夏天涨水的时候经常有小孩子会被淹死，所以他就修游泳池教孩子们游泳。

另外一个就是麻风病院，柏格理生前是一心一意地想要帮助麻风病人，但他生前没能够建立麻风病院。这个工作是由张道惠来完成的。张道惠，这边要插一句，当时教会他们开会的时候，教会

的会议中主张修麻风病院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道惠，另外一个就是格兰丁医生。其实格兰丁医生更有力度，因为她是一个医生。格兰丁医生在会议当中非常坚决，她说不管这个会议同不同意，她都要修建麻风病院。然而很可惜的就是，会议之后不久，格兰丁医生也去世了。但张道惠最终还是能够实现了，在石门坎修建麻风病院，做成了这件事情。还有就是石门坎的孤儿院，孤儿院是有一次张道惠在路上看到有一群人在埋葬一个分娩时死去的妇女。那个妇女生孩子的时候，母亲死了，但孩子刚生下来还在，但那个时候又是饥荒的年代，没有任何家庭愿意照顾这个孤儿，所以他们就打算把孩子和他死去的妈妈一起埋葬掉。张道惠遇到了这个事情，他把那个小孩儿——汉族的小孩儿救了下来，给他找了家庭。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想着一定要修一个孤儿院。后来他去英国筹款，怀特岛上一个主日学校的师生，他们放弃了一次旅行，把这些钱捐给了中国西南这个教会，让张道惠修建了孤儿院。

张道惠另外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土豆，石门坎、威宁那一带的土豆，是张道惠引进去的，他是1906年，托传教士同工从英国带来了土豆的种子，他的夫人安妮是一个农夫的女儿，安妮就跟他讲，你这样做不行，土豆都是用小土豆种出来的，你用种子来种土豆是很难种的。但是张道惠还是坚持尝试，他用土豆的种子第一年种出来很小很小的土豆，第二年他又把这些小土豆拿来种，然后第三年，又用土豆这样种，后来土豆就在那边流行开了，并且在饥荒的时候，成了那边人很重要的一种食物。

张道惠他的很多工程，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还有在石门坎种了很多树。现在石门坎很多树其实都是张道惠那时期种出来的。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在他主持石门坎工作期间，石门坎发生了两次大的饥荒。这两次饥荒他就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来修建了这些东西，然后修建的人，就可以得到粮食，就可以度度过饥荒，这是他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张道惠的夫人安妮也是特别热爱苗族，在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当中，安妮的苗语说得是最好的。一群关着门，一群苗族人在说话，安妮也在其中的话，在外面的人听不出来，里面有一个外国人，有一个人的母语不是苗语。还有一个就是石门坎苗族妇女的发型。去过石门坎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发现苗族已婚妇女，她们头上都别着一个梳子的那种发型，我第一次去石门坎的时候，我以为那是苗族的一种古老的发型，后来才发现不是，那是安妮经常梳的一种发型。

2005年，石门坎教会百年庆典和学校的百年校庆的时候，张道惠的孙女儿克里斯汀来到石门坎。那次我也和她一起，那次来了很多人，克里斯汀就站在我旁边。她自己嘟囔了一句，我是无意中听到的，因为我就站在她旁边。她因为看到漫山遍野的苗族妇女发型，她说：“哎呀，这都是我奶奶当时梳的这个发型。”其实我当时并不相信，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但后来通过不断地考证，然后我又去了英国，最终真的是可以确定，那就是安妮那种发型。现在大花苗已婚妇女的发型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妇女的发型。所以这也很让人感动，因为一个人，或者是传教士，不管怎么说，他们竟然把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妇女的发型，变成了大花苗的民族习惯，现在成了苗族的这种发型，所以是一件很令人惊叹的事情。

1926年，张道惠夫妇回英国休假，休假结束以后，医生不准他们来中国，说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可以再来中国了。安妮很难过，她一直哭。但是，再后来他们在石门坎长大的双胞胎儿子张绍乔和张继乔，1926年回英国以后，在英国接受了教育，他们的志向都是要返回中国传教。张绍乔是读了大学，张继乔是读了神学院，他一心就想去石门坎。那个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他来到中国，他一心想去石门坎，但一来到中国就被分派到了上海。后来他被关进了浦东集中营。前段时间我翻张继乔老先生给我的信，信里边还提到了这段历史。其实他一直都有点抱怨那个把他分到上海去的人，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在集中营的时候，他说：“就是感觉饿，一天都是很饿，饥饿的感觉特别印象深刻。”这是张继乔，他到中国以后就被关进了集中营，他是1945年被放出来，返回英国探



亲结婚，然后很快他又申请到中国传教，这次是来到石门坎，张继乔他是驻石门坎的最后一任英国牧师。

张绍乔，来中国的时间比张继乔晚，比张继乔第一次来中国的时间晚两年。他是 1941 年的时候申请来中国，这一点是让我很感动，也很震撼的，因为，张绍乔是哥哥，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张继乔还在集中营里。弟弟在战乱的中国被关在集中营里，他又申请来中国。这也还好说，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张道惠夫妇，他们两个竟然也同意了。一共就这两个儿子，一个在战乱的中国被关在集中营里，另一个不顾一切还要来中国，然后他们竟然同意了，我想这应该是信仰最伟大的力量。张绍乔非常幸运，他来到中国以后就直接到了威宁，在他的父亲张道惠冒着生命危险购买的土地上建了教堂和学校。那些老建筑现在还在威宁民族中学的旁边，现在还在，残垣断壁，有一个房子是已经快不行了，快垮了，另外两个还好。

张绍乔和张继乔兄弟二人在传教的同时，还为苗族人做了一件事，就是他们两个在这时期搜集了大量的苗族古歌、故事、歌谣，并用柏格理苗文记录了下来。1949 年的时候，他们把这些资料带回英国保存并研究了半个世纪，在 90 年代送回了中国。期间他们创造了苗文软件，创办了苗文网站，把这些资料翻译成英语。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用的苗文软件，最初其实是他们在英国请人创建的，他们这一生都深深地爱着石门坎，并时时刻刻牵挂着石门坎。

另外一个我想介绍的英国传教士是王树德。前两天阿信也讲过了，柏格理来中国传教，之后回去过两次英国度假。第一次就带回来了这本传记的作者格里斯特。第二次他回英国度假，是因为他被打了，必须得回去疗养，所以他才回去，否则的话，他本是不愿意回英国的。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带的就是王树德，王树德也学会了苗语，他是柏格理后期非常好的助手和朋友、伙伴。

王树德，他个人资助了朱焕章、张超伦。朱焕章是石门坎的苗族的教育家，张超伦是石门坎滇东北次方言，就是大花苗的第二位苗族医学博士。他们读书都是王树德个人资助出来的。还有就是1946年，他那个时候已经调到上海。他也是和张继乔一样被关到集中营的。关到集中营以后出来，教会是补发了他的工资。那个时候，朱焕章找到他，给他讲了石门坎办中学的困难，他就把补发的薪水一共3万美元全部捐了出来。当然这3万美元，也给西南的各教会分，石门坎得了5000。王树德终身未婚，晚年穷困潦倒。

最后大概讲一下苗族的本土布道员，介绍两位，一是吴性纯，他是石门坎培养的第一位苗族博士，他是进入华西协合大学深造，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回到石门坎担任光华小学的校长，并在石门坎建立了一所PM医院，用汉语拼音就是“平民医院”；用苗语就是“彼阿卯”，意思就是“我们苗族的医院”；英文就是“Pollard Memory”，就是“纪念柏格理的医院”。吴性纯也特别注重培养人才，像朱焕章，还有李正文，李正文是苗族第一个进神学院的牧师，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个苗族牧师。还有包括卫生、体育事业方面。

朱焕章也是就读于华西协合大学，他在读书期间就编写了《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帮助人们扫盲。毕业的时候，他拒绝了蒋介石为他提供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致力于苗族教育的发展。1943年，在条件无比艰苦的情况下，创办了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为石门坎教育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还有一位是王志明，他是20世纪的十大殉道者之一。我们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门上都有他的塑像，他是死于文革期间。一直被关押，政府的人威胁他，就说只要你放弃你的信仰就可以放了你，但是王志明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临死的时候舌头是被搅碎了的，是为了防止他呼喊。石门坎不仅仅是这些，包括我们群里的李奶奶的爷爷李国钧也就是李约翰、五爷爷李斯提反，还有汉

族的钟焕然，还有在石门坎的汉族老师李映三，还有很多很多人……石门坎，它是很多传教士，好几代人共同谱写的一个故事，也希望后继者能继续把这个故事谱写下去，我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由叶先春姊妹根据东旻老师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的分享录音整理，由张珏姊妹核对）